

主编 郝时远 朱 伦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Translation Series

民族学人类学译丛



*Political Anthropology
— An Introduction*

政治人类学导论

[英] 特德 C. 卢埃林 / 著

朱 伦 / 译

最近40年，政治人类学是在混乱和零散的状态下成长起来的。卢埃林在这本清晰简明的研究著作中，勾画出了该学科理论结构的发展，以及主要人物的个人贡献。政治人类学家一直致力于研究其复杂性和发展水平不同的社会怎样维护秩序和解决内外冲突。他们的研究成果、问题、困惑和成就是什么，广大读者都可以从本书中了解到。人类学家对政治结构和过程展开的一系列研究，既有文化间的比较，也有专题探讨；对各位人类学家的努力和不足，作者都一一做出了评论。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引导我们走近这个日益重要的学科进行追根溯源的出色向导；我认为，这个向导的水平无人可比；他的批评一针见血，他的风格独具特色。他的观点客观公正。作为学生，我是英国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第一代政治人类学家；作为教授，我是美国中间一代的政治人类学家；因此，我可以证明卢埃林教授的结论是准确恰当的。我为他的尖锐批评不禁鼓掌喝彩，即便他的批评对准了与我的理论信念相近的学者所持的立场。卢埃林教授坦陈说，他写的不是一部教科书，的确，大多数教科书都是篇幅宏大、材料堆积如山，且大部分内容是描写佳话。卢埃林教授的这本书简明扼要，自成一体。这总是我们所期望的政治人类学导论。本书像是一面分辨率极高的彩屏，不仅学生，包括资深学者，都可从中读到有价值的东西。同时，这本书既是一个总结，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弗吉尼亚大学人类学部 维克托·滕纳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政治人类学导论

[英] 特德 C. 卢埃林 / 著

朱 伦 / 译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人类学导论/(英)特德 C. 卢埃林著;朱伦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1

ISBN 978 -7 -81108 -623 -2

I. 政… II. ①特…②朱… III. 政治人类学 IV. 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4538 号

政治人类学导论

- 策 划 戴佩丽
作 者 特德 C. 卢埃林
译 者 朱 伦
责任编辑 华 山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毫米) 1/32 印张:5.625
字 数 140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7 -81108 -623 -2
定 价 15.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中国的翻译历史十分久远，先秦文献有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华夏互动关系的记述，就包括了翻译的桥梁作用，即“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①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翻译不仅在“五方之民”及其后裔的漫长互动关系中始终发挥着沟通理解作用，而且也是中国认识世界、引进域外思想文化的工具，其中佛教经典的翻译可谓最大的工程。

近世“西学东渐”是中国社会步入世界现代进程中的巨大动力。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屈辱中开始重新认识世界，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四洲志》，魏源进而增修汇编的《海国图志》，开启了中国近代译介西学的先河，即所谓“中国知西政之始”。译介西学是中国仁人志士从过去视域外技艺为“奇技淫巧”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念变革，而甲午之后则成为中国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之急务。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这方面的推动和身体力行，使“西学东渐”的规模和内容逐步涵盖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其中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著作也渐次介绍到中国。如1902年章太炎翻译的日本学者有贺长雄的《族制进化论》，1903年，林纾、魏易根据英译本，翻译的德国民族学家哈伯兰的《民种学》(Ethnology)，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著作《天演论》，均属西方民

^① 《礼记》，“王制”，第五，引自《十三经注疏》。

族学、人类学著述进入中国的开山译作。

中国虽然有编写民族志的历史传统，但是作为现代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化发展则仅有百年的历史。在推进这些源自西方的学科本土化发展进程中，译介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代表作，一直是推进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发展不可或缺的基本建设之一。因此，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早期开拓者和著名前辈，往往也是从译介国外民族学与人类学名著名篇开始其学术生涯，而这一治学特点也成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推进学科建设、发展学术事业的自觉传统。百年来，中国学界对国外民族学与人类学著作的翻译虽然在不同时期有所偏重，但是可以说从未间断，国际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发展、理论流派和前沿话题，基本上为国内学界所熟悉，并在本土化运用中发挥着作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学、人类学的译介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国外民族学、人类学的历史经典、现代新作不断为学人所译介，如1979-1994年的《民族译丛》杂志即是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学术翻译载体。同时，国外民族学、人类学著作的翻译也日益增多。据不完全统计，国内有30多家出版社相继推出了数以百计的民族学、人类学译著，而且近年来呈现系列性刊布的发展趋势。这些译著涉及面之广，不仅涵盖了学科基本理论和方法、经典民族志，而且涉及了民族学、人类学的诸多分支学科。

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不不断融入国际社会，在与世界互动进程中实现发展。中国的学术事业也是如此，在持续和不断深入的国际交流中走向繁荣。其中译介国际学术的最新成果，是实践学术交流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国面对着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其中民族问题即是具有普遍性的领域之一。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是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重要的智力源泉。民

族问题历来与诸种社会问题渗透交叉，无论是对民族大千世界而言，还是对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领域，以及人口、宗教、语言、人权、生态、城镇化等专门话题，都是民族问题的题中之意。而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分文化发展，与其他学科的不断交融，其中必然地包括了适应民族问题普遍性、复杂性、长期性、重要性和国际性特点的意义。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民族学人类学译丛》，基本主题属于民族政治学或政治人类学范畴，突出了民族（nation）、民族主义（nationalism）、族性（ethnicity）、族群（ethnic group）理论概念的研究特点，包括了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少数人权力（minority rights）和前苏联的个案研究，提供了政治人类学导论和世界范围族群口径的分类资料，其目的是为了就国内诸多学科所关注的民族、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多元文化、公民身份、少数人权力的研究和有关“族群”概念的理解、争论和应用，提供更多的学术参考。在这方面，相关译者和出版社已经推出了一些出自名家之手的著作，这套丛书将进一步就同类话题展开更广泛的学术探究，以满足国内学界不断增强的学术需求。

毫无疑问，在学术翻译中，概念体系的对应或新构历来存在着困扰。诚如国学大师王国维曾面对近世“西学东渐”不胫而走的大量新概念所说的那样，“故我国学术而欲进步系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轰轰而入中国，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①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对“民族”、“族群”这类概念的研究、阐释和论争，也是如此。所以，在这套丛书翻译过程中，基

^①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载《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87页。

本概念问题依然是难点，期间虽然力求统一，但是每一个译者对同一概念的理解不尽相同且直接关系到对其论理的理解。因此，在这套丛书中我们要求译者尽可能地保留一些基本概念的原文，以使读者全面准确地理解原作的意思，我想这也应该成为学术翻译的基本规范。

概念及其定义，是对相关要素、特征的概括和理论阐释的支点。因此，沃勒斯坦认为：社会科学文献的翻译事实上是概念的翻译问题，因为社会科学的讨论往往以概念为核心，而概念又是经过作者自己清晰界定和应用的。概念是公诸众人的意义参照，也是资料、数据的综合描述，是对现实世界的分类。同时，由概念引起的矛盾也比比皆是^①。在全球化进程迅猛发展的今天，国际交流中的概念引进或再造，早已不是王国维先生所处的那个时代可以比照的了。然而，虽然“犹不得不造新名”已属常态，但是以“新名”取代“旧名”却需要斟酌。人们在全球化时代对“本土知识”的眷恋，固然反映了对“我是谁”的重新寻觅、伸张甚至构建的保守，但是又何尝不是力图将“本土知识”推向世界的自尊、自信？

在一个承认甚至逐步崇尚文化多样性的时代，学术研究的视角也呈多样化的散射，全球化的进程给学人更加多样的选择。一系列新的术语、概念正在纷至沓来，为学人提供了新视野、新理念甚至可以标新立异加以发挥的新观点。或许它们的产生符合发达的、后现代的西方社会时代特征，甚至它们也正在被谋求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用来证明融入国际社会的标志。但是，作为中国学者的首要学术责任是立足于国情实际的科学研究，而不是对西

^① 转引自：【美】麦克洛斯基等：《社会科学的措辞》，许宝强等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83页。

方话语的“翻译”或“西式中文”的论说甚至削足适履的套用。“西来之说”的“本土化”固然重要，因为它体现了吸收与借鉴的必然要求；而“本土之说”的国际化又何尝不是这个过程的主题中之意？我想这应该是译介的意义。

中国学界译介外国学术著作将会是一个长久持续的学术工作，这是我们与国际学术界交流沟通的重要桥梁，也是推动自身发展的重要条件。也许有一天，中国的学术著作，包括民族学、人类学的著作会被外国学术界所译介，虽然这一天为时尚远。但是，译介国外学术著作能够为这一天更早的到来创造条件则毋庸置疑。因此，这项工作是十分有意义的。需要指出的是，这套丛书的出版，恰逢2009年第16届国际民族学人类学大会在中国举办，它对国内学术界更多的了解国际学界的研究成果，使国外学者认识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开放和发展的取向，无疑也大有助益。为此，我们感谢诸位译者辛勤的劳动，也感谢出版社为推出这套丛书做出的努力。同时，也期待着学界同仁、广大读者的支持和指正。

郝时远

2008年11月12日于北京

序 言

最近 40 年，政治人类学是在混乱和零散的状态下成长起来的。卢埃林在这本清晰简明的研究著作中，勾画出了该学科理论结构的发展，以及主要人物的个人贡献。政治人类学家一直致力于研究其复杂性和发展水平不同的社会怎样维护秩序和解决内外冲突，他们的研究成果、问题、困惑和成就是什么，广大读者都可从本书中了解到。人类学家对政治结构和过程展开的一系列研究，既有文化间的比较，也有专题探讨；对各位人类学家的努力和不足，作者都一一做出了评论。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引导我们走近这个日益重要的学科进行追根溯源的出色向导；我认为，这个向导的水平无人可比：它的批评一针见血，它的风格独具特色，它的观点客观公正。作为学生，我是英国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第一代政治人类学家；作为教授，我是美国中间一代的政治人类学家。因此，我可以证明卢埃林教授的结论是准确恰当的。我为他的尖锐批评不禁鼓掌喝彩，即便他的批评对准了与我的理论信念相近的学者所持的立场。

卢埃林教授坦诚地说，他写的不是一部教科书。的确，大多数教科书都是篇幅宏大，材料堆积如山，且大部分内容是描写性的。卢埃林教授的这本书简明扼要，自成一体。这应是我们所期望的政治人类学导论。本书像是一面分辨率极高的彩屏，不仅学生，包括资深学者，都可从中读到有价值的东西。同时，这本书既是一个总结，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弗吉尼亚大学人类学部 维克托·腾纳

目 录

序言	(1)
导言	(1)
第一章 政治人类学的发展	(7)
第一节 19 世纪的进化主义者	(8)
第二节 反对派	(11)
第三节 不列颠功能主义者	(13)
第四节 过渡期	(16)
第五节 新进化主义者	(18)
第六节 决策的过程与采取	(20)
推荐书目	(21)
第二章 前工业政治制度的类型	(23)
第一节 非集权制度	(30)
第二节 集权制度	(42)
推荐书目	(51)
第三章 国家的进化	(54)
第一节 内部冲突理论	(59)
第二节 外部冲突理论	(61)
第三节 “水利文明”	(63)
第四节 人口压力	(65)
第五节 领导地位制度化	(68)
第六节 系统理论	(70)
第七节 原始国家:文化间的证明	(74)
推荐书目	(77)

第四章 政治中的宗教	(79)
第一节 神圣合法性	(80)
第二节 宗教符号的操纵	(82)
第三节 “离经叛道”宗教的适应价值	(83)
推荐书目	(85)
第五章 政治继承	(87)
第一节 不确定领导地位	(88)
第二节 世袭继承	(89)
第三节 拉美模式	(93)
推荐书目	(97)
第六章 结构与过程	(98)
第一节 结构-功能主义	(98)
第二节 过程观点	(102)
推荐书目	(113)
第七章 政治竞技场上的个人	(115)
第一节 社会心理剧	(116)
第二节 游戏理论	(118)
第三节 宗派	(124)
第四节 政治符号论	(126)
推荐书目	(130)
第八章 工业社会的政治	(133)
第一节 现代化过程	(134)
第二节 现代社会中的正式政治体制	(141)
第三节 结语	(149)
推荐书目	(150)
术语表	(153)
参考书目	(158)

导 言

政治学教授戴维·伊斯顿在1959年的一篇论文中否定政治人类学的存在，其理由是参与这一假学问的学者，未能对相对于社会其他亚制度的政治制度作出界定，从而遭到了彻底失败。当时，人们普遍接受了他的看法，因为作为一门年轻学科只好老老实实地任由其他老成学科的批评。经历近10年时间，人类学家才满怀信心地宣布伊斯顿对政治人类学学科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他把政治人类学学科的长处看成了短处（Bailey 1968；A. P. Cohen 1969；Southall 1974）。在人类学家一直研究的那些社会中，对政治的分析不能脱离亲属关系、宗教、年龄群体、秘密社会等等，因为这些组织恰恰是权力和权威赖以体现的机体；在许多社会中，“政府”根本就不存在。这一认知，加上一种明显不是在政治组织中所使用的政治语言表达形式，或许是进行比较政治研究的人类学家的最主要的贡献之一。最近，政治人类学家已经把这一观点引入到神圣的政治学领域之中，证明了非正式组织和关系可能比正式组织和关系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即使在像美国或以色列那样的现代政府中也是如此。

但是，对政治人类学多有研究的学者罗纳多·科恩，继续持伊斯顿的观点，认为“直到目前为止，人们对（政治人类学）应当包括或排除的东西，以及对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应当是什么，并未牢固地达成共识”（R. Cohen 1970：484）。遗憾的是，这种状况在最近10年并无变化。1980年，在我接受为《政治行为手册》撰写“政治人类学”（Lewellen 1981）这一章时，如同其他类似任务一样，我试图为政治人类学学科的成就和核心问题

勾画出可作比较和专业思想导向的大致线条。这似乎是一个简单明了的任务；不管怎样说，有现成的三本名为《政治人类学》的著作（Balandier 1970；Seaton & Claessen 1979；Swartz, Turner & Tuden 1966）可资利用，还有《人类学年鉴》上的有关概论（Easton 1959；Vincent 1978；Winkler 1970）、《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和各种人类学手册中的文章作为参考。但这是一个看似容易，做起来难的任务。虽然政治人类学作为文化人类学的次级学科已经建立起来（历经近 40 年才被承认，在拥有人类学部的系科里，虽不是大部分，但有许多系科已经可以颁发政治人类学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但实际上，在上述任何著作和论述中都看不到有关政治人类学的清晰轮廓。

当然，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很有价值的短文，但其数量有限，并且普遍涉及的是时髦的“过程理论”的这个或那个方面。另外，文化人类学经常倾向于甚至只注意对前工业政治制度进行分类，尽管许多人类学家早就放弃了这类课题。对政治制度进化这个基本问题，经常是过于依赖考古学家，有时又被作为另一次级学科任由它去。这给人的印象是，政治人类学的兴趣和目标要么非常狭窄，要么宽泛无边，难以说清楚。

此书面临的问题之一，无疑是应当给读者留下一个提纲挈领的印象。虽然有些研究者特别是罗纳多·科恩、阿布纳·科恩、埃尔曼·瑟维斯、乔治斯·巴拉兰迪尔和 F·G·贝利等人自认为是“政治人类学家”，但他们的相关文章大多是按照文化人类学家的路数来写政治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政治人类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种学术大杂烩，它的几个不太大的课题分类却要人们劳心费神地去想象。

说完这些，我们可以开始描绘政治人类学的几大线条了。首先是政治制度的分类（clasificación）。对日益失真的分类学，人们现在已没有当初的热情，但政治制度分类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

领域。其次是政治制度的进化（*evolución*）。虽然英国和法国人类学家时常说进化论已随摩尔根而去，但进化论在美国则继续令人痴迷。第三是研究前工业社会的政治制度的结构和功能（*estructura y funciones*）。这个观点因具有静止和理想的性质，在大西洋两边曾被断然抛弃，但在经过一阵革命风暴之后，人们普遍承认，即使是最有活力的政治进程也有结构界线相对稳定的容积。不管怎样说，政治人类学产生于这种范例，许多经久不衰的著作是结构—功能主义的著作。第四是最近 20 年对前工业社会的政治过程（*procesos*）或发展道路进行理论研究。目前，最稳定的趋向是对政治行为（*acción*）的研究，这是过程理论的一个分支，它重视研究人的操作战略而不是变化的机制（*instituciones*）。第五是对古代部落社会的现代化（*modernización*）和对工业国家的各种现代政治机制进行广泛和不断深入的研究。

超出这些细小“课题”的框架之外，人类学与其他学科共享一系列共同的价值和前提，这些价值和前提似乎已经在人类学园地扎根。

人类学的视野

《非洲的政治制度》（1940）一书被认为是政治人类学的奠基著作，迈耶·福特斯和 E. E. 埃文斯—普里查德在引言中明确指出：“证据表明，任何政治哲学理论都不能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所研究的社会，我们认为这些理论没有多少科学价值……”（第 1 页）这个观点大可作为政治人类学孕育时期的口号。直到 60 年代中期，政治人类学的理论框架、方法、术语和关注核心很少有别于政治科学、政治社会学或政治心理学。在 1960 年以前的文章中，我们可以不时见到作者引述黑格尔、马克思、齐美尔、帕森斯或者伊斯顿的议论，但从整体上看，那时的人类学家不可避免地仍然是政治学的门外汉，始终坚定不移地固守人类学的视

野。随着人类学家逐步转向研究现代“国族—国家”（nacions - state），并开始吸收源于其他学科的系统理论和决策模式，这种局面现在完全改变了。但在许多方面，政治人类学继续又是“人类学”，又是“政治学”。

首先，人类学的基础是田野经验。人类学研究者与当地入朝夕相处，按照拉尔夫·尼古拉斯的说法，他们试图“在奔波忙碌的混乱人群中发现一种秩序”（Nicholas 1966：49）。这个看起来十分简单的目标，实际上是极端复杂的事情。愈是接近处在自然状态的现实人群和社区，愈是难以对他们的行为举止进行概括。这种状况产生了一种被称为“邦戈—邦戈主义”的争论：撇开可能有的概括，总有人叫道：“唉！但事实是，邦戈—邦戈部落的行为并非如此。”最保险的说法或许是，可能会有某个邦戈—邦戈部落（苏丹境内）未被理论家发现。由此而论，人类学无疑应是一个推断性和比较性的学科。理想状态也许是，概括性理论应当来自于经验主义的田野资料，它应当以文化间可比较、可研究的形式提出。政治人类学的前辈们立刻发现，根据在美国或西欧进行的研究而得出的概念，几乎无法运用于狩猎—采集群体或农耕部落。

美国人写的人类学导论教材，大多数把文化（cultura）一词作为对现存社会制度进行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概念，这有点族类中心主义（etnocéntrico）的味道。英国人和法国人对文化这个比较模糊的概念不怎么重视，美国许多唯物主义和生态主义理论家则对这个概念持完全否定的态度。适应（adaptación）这个概念或许更有用处。几乎所有的人类学著述，或含蓄或明确地都有这样的表示：有关人民对他们的环境都作出了理性适应回答。这并不是说人们的行为都是善适应，也不是说某些机构没有做出坏适应（如果整个社会做出坏适应，这个社会就无法生存下来），只是说任何社会制度都不是随心所欲的产物。

另一个重要概念产生于既不是专业人员又不是专业机构对“原始”人民进行的最初研究，这个概念是：任何社会都是由相互联系的关系网形成的，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其他环节。目前，人们对这一认识的理解虽已不像开始那样严格（一些亚群体的相对自治就是显而易见的证明），但把社会理解为是一种整合的制度（*sistema integrado*），依然是人类学视野下的基本观念。鉴于各种经验科学长期以来奉行两极起因模式，人们有时竟以为“制度”这一概念是个新发现；但这些人有所不知，从19世纪中叶起，人类学家实际上一直在不间断地同时研究社会和制度。是的，对各种假说进行文化间验证，需要确定来源于具体文化背景的各个单位的孤立状态，但这种具有自己的统计方式的验证则是在相当晚近的时候进行的，并且通常需要借助一种制度框架。人类学的所有范式，如进化主义理论、各种功能主义学说、法国结构主义、过程理论、决策理论等等，基本上都是一些“制度理论”（*teorías de sistemas*）。最后，进化论虽然在社会人类学界受到大张旗鼓的鞭挞，但它仍然是被默许的一家之言，甚至在最具时代精神的研究范式中都暗藏着它的身影。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人类学关注的是体现技术和社会发展全景的一切社会，如不参考某类文化复杂的社会，断无可能对它们进行研究。

推断（*inducción*）、文化间比较（*comparación intercultural*）、适应（*adaptación*）、制度（*sistema*）和进化（*evolución*）这些术语，实际上并非是人类学的定义域（*cualidades definitorias*），而是当今世界人类学概念的不同方面（*diferentes aspectos*）。如果说这些方面构成了一个统一观点的话，这个观点则充满了矛盾。人类学家的追求是捕捉人类的本性，但他们又怀疑任何概括。他们崇尚整体视野，但由于拿来比较的制度复杂多样，他们又不得不圈划出一个一个小的亚制度。他们呼喊精确分类，同时又说任何

类型学都是更加弄乱了被分类的东西。简言之，人类学家把自己置于两个截然相反的要求之间：他们一方面直言自己的田野观察具有深刻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给自己的田野观察充填内容并把它们推向全世界。

政治人类学是人类学中最具诱惑力的专业领域之一，此书是一本相对来说不难读的概论，是为那些想找这类概论的读者写的。我说“不难读”，是因为此书既不是学术专著，也不是“问题总汇”，更不是连上帝都不喜欢的“专业论文集”。我一直想写一本政治人类学导论，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就想写这样一本书：为理解最直接的民族志描写和理论描写提供必要的基础知识，就像为一部上演的戏剧作品介绍背景和意义那样。人类学专业的学生读起来不难，专家（包括人类学专业之外的专家）不会被吓跑；书中我主要介绍其他人的研究，而介绍的形式则尽量简单，对许多复杂思想的介绍力争言简意赅。如果此书能做到这一点，引起读者对政治人类学这个边缘学科的兴趣，使读者把握“问题的精髓”，我将感到欣慰。

最后，我对里士满（Richmond）大学两度给我学术补贴撰写和出版此书表示诚挚的感谢。同时，我也要感谢吸收我参加《政治行为手册》编写小组工作的萨姆·朗先生，还要感谢该手册出版者普利努姆（Plenum）出版社惠允我使用该手册中我的近一半原文（见该手册第3卷）。